

評介趙軍《大亞細亞主義與中國》

廖代翔*

書名：《大アジア主義と中國》

作者：趙軍

出版時地：東京，亞紀書房，1997 年

頁數：379 頁

—

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亞細亞主義無論就定義、評價來說都是一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議題。譽之者盛讚其亞洲聯合以共抗西力東漸浪潮的理想，謗之者則批判為日本將其對外擴張合理化的「大義名分」。對於此一在亞洲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思潮，不僅是日本方面，中國學界關注者亦所在多有，本書作者趙軍即為一例。

本書是作者將歷年所發表的多篇論文經過修改整理而加以出版，以思想或行動層面上對於亞細亞主義有所著墨的人物為主軸，期能釐清此一思潮在近代中日關係史上扮演的角色。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二

本書內容共分十章。第一章「序論・近代日本與中國的一個銜接點——圍繞著大陸浪人、大亞細亞主義與中國的關係」，作者對於「大陸浪人」所下的定義，是指日本近代史上有志於大陸經營的民間人士以及一部份政治家、軍人的統稱，大部分為國權主義、擴張主義者，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尖兵。而將大陸浪人導向中國革命，也可以說聯繫兩者之間的是大亞細亞主義的政治理念。做為一種政治思潮，大亞細亞主義雖然分歧，卻有幾項共通點，一方面是對歐美諸國的反抗心理，以及對於亞細亞諸國（尤其是東亞的中國、日本、朝鮮三國）的連帶感；但其內容的多變性、形式上富於多樣性，以及容易融入其他政治思想的融合性，卻又成為其另一特色。而由於目標與手段的不同，可大略劃分為兩大類別，一是民權主義、民主主義性的「亞細亞連帶主義」，強調亞洲民族在平等自主的原則下互助，確立亞洲團結，驅逐歐美勢力；一是國權主義、軍國主義性的「大亞細亞主義」、「大日本主義」，在「八紘一宇」的理想下，使亞洲諸國為一體，取代歐美建立日本的亞洲支配。

第二章「注入熱情的亞細亞連帶論—宮崎兄弟的支那革命主義」。所謂「宮崎兄弟」指的是宮崎八郎、民藏、彌藏，以及最有名的宮崎寅藏（滔天），而討論焦點實則聚焦於宮崎滔天。其「支那革命主義」的特徵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中國、日本、朝鮮三國聯盟，各國基於民主、平等原則，處於平等共存的同盟關係，是自由民權派大亞細亞主義者的代表性主張。

第三章「以『皇國亞細亞體制』為目標的興亞思想—以頭山滿為例」，則是探討與宮崎滔天相對照的國權派大亞細亞主義，代表之一即是頭山滿的「興亞思想」，其思想特徵有二：一是攘夷論，憎恨歐美列強對亞洲的侵略，而欲將其勢力逐出亞洲，協助中國、朝鮮、印度等國獨立；二是尊皇論，獲得獨立的亞洲諸國置於日本

指導之下，與日本締結軍事同盟，成為皇道樂土，將日本勢力擴及亞洲。

第四章「『苦節十年併合謀』—內田良平的大亞細亞主義與中國革命」，內田良平的大亞細亞主義思想雖然有藉由日本、中國、朝鮮等亞洲諸國的聯合、提攜，對抗歐美諸國的亞洲侵略的思想內涵，但基本立場仍是以日本為宗主國，藉由合併、控制周邊諸國，完成亞細亞聯邦，和頭山滿同為國權主義者的代表性思想之一。

第五章「中國革命運動的逆行者—川島浪速的大亞細亞主義」，川島浪速的大亞細亞主義思想雖然主張將亞洲民族由歐洲的侵略中加以解放，看似與宮崎兄弟的「支那革命主義」相類似，實則是以滿蒙獨立運動、滿蒙建國為基礎，和日本軍部的軍國主義擴張活動完全吻合，其理論終究是要在亞洲乃至於世界中建立日本的殖民支配體系。以對於中國革命的態度加以區分，頭山滿、內田良平可說是欲利用中國革命運動侵略中國的右派勢力；川島浪速則是反對革命的極右派；而宮崎滔天則代表真正支持革命運動的民權派大亞細亞主義者。

第六章「吾人之大亞細亞主義中的孫文對日觀—孫文與大亞細亞主義」，則回到中國的角度，探討孫文對於日本大亞細亞主義的回應。其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想發展約略分為三期：第一階段是 1911 至 1916 年，這是孫文與日本式大亞細亞主義同調的時期；第二階段是 1917 至 1918 年前後，這是其大亞細亞主義的轉換期，而在 1919 年後發生明顯變化，認識到了帝國主義者的大亞細亞主義的侵略性、欺瞞性；而在 1923 年後半至 1924 年的第三階段，逐漸形成「吾人之大亞細亞主義」，揚棄了前兩階段承認日本盟主地位的主體型世界體系思想，轉變為否定上位主體存在的非主體型世界體系思想。

第七章「做為武器的日本論—由日本論所見戴季陶的日本觀」，做為留日學生、孫文的機要秘書，戴季陶的《日本論》藉由讚美日本的歷史與文化，批判日本現實的軍國主義政策，除了有過

份強烈的政治傾向之外，也不能忽視其欠缺科學客觀性分析的缺陷。

第八章「日本的民間外交與中國—以久原房之助與中國的關係為例」，財閥出身的久原，其對外思想，從國權主義轉向軍國主義，到二次大戰後的和平主義，雖然對於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時有批判，其目的仍在於發展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擁護日本的國家利益，依舊不脫「民間外交」的架構。

第九章「泛亞細亞體系的交錯與平行—其後的大亞細亞主義」，作者主要聚焦於中日戰爭爆發後，中日兩國圍繞著近衛文麿內閣提出的「東亞新秩序」，所引發對於大亞細亞主義的各種不同詮釋甚至批判、論戰，指出大亞細亞主義由於主張者的政治理念、民族立場的歧異，彼此之間時為交錯，時為互無交集的平行線，此一平行關係在和平時期為理論上的對立與論戰，在政治變動與戰爭期間，則引起國家、民族對立。交錯與平行的一再重複，正是附著於各種政治理念而形成的大亞細亞主義的特徵，亦為其缺陷。

第十章「總結·朝向亞洲共生的遙遠之路—大亞細亞主義的方法論及現實性」，指出大亞細亞主義是反映了時代變化的主張，其思想基礎中無法忽視其民族主義，包含大和民族優越論以及對亞洲諸國的輕蔑觀，兩者相輔相成，決定了日本近代大亞細亞主義思潮的基本方向；加上日本採取歐化政策，價值觀的改變使其喪失了和亞洲民族之間連帶理念的支柱。亞洲諸國對日本的認識也從「日本期待論」轉向「日本警戒論」。因此民權派宮崎滔天以「興亞」為目的的大亞細亞主義固然在軍國主義體制下毫無可行性，而國權派以「征亞」為目標的大亞細亞主義雖與大陸政策方向一致，卻同樣隨著二次大戰戰敗而破滅。

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學界針對大亞細亞主義加以探討

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竹內好，其對於大亞細亞主義的若干論點雖具有相當爭議，然而仍為研究者所不得不加以認真審視。相形之下，中國方面或許由於歷史及政治因素，對大亞細亞主義的理解多半難脫中日之間的歷史情結，若真要論及嚴謹的學術研究則相形見绌。作者盡可能的跳脫歷史情感，而在論述分析上力求客觀。儘管他批判大陸浪人多半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亞洲的尖兵，然而對於主張亞洲各國平等聯合的宮崎滔天卻仍不吝給予高度的肯定。對於孫文在辛亥革命前後，對日本國權派大亞細亞主義者的侵略性、擴張性缺乏充分的認識，他也直陳不諱。這可以說是跳脫歷史情結，對大亞細亞主義進行學術研究的基本態度。

本書有幾個優點值得一提，首先是對於日本方面，尤其是竹內好既有的研究成果，作者能加以批判性的接受，例如竹內好指出亞細亞主義並非具有實質內涵，能夠客觀限定的思想，而應該說是一種思想的傾向性。¹初瀨龍平亦指出亞細亞主義強調的連帶思想，是難以純粹性的存續並發揮其作用，往往有轉化為某一種意識型態的危險，因而即便是純粹的亞細亞連帶主義，都有可能轉為侵略亞洲的大亞細亞主義。²而作者認為大亞細亞主義本身的理論基礎相當薄弱，是「西力東漸」國際關係下的產物，因而造成其內容的多變性，以及形式多樣性，同時極易融合於其他政治思想，這些論點都可以說是承襲竹內好等人的理論而來。但對於竹內好的某些觀點，作者也從中國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見解，竹內好認為大東亞共榮圈是抹殺了包含亞細亞主義在內一切思想而成立的虛擬思想³，作者則從中國方面對於東亞新秩序的批判，指陳東亞新秩序乃至於大東亞共榮圈，與轉向「征亞」的大亞細亞主義之間實難脫關連。足證作者雖然從竹內好等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出發，但也在秉持學術

¹ 竹內好，〈アジア主義の展望〉，收入竹內好編，《現代日本思想大系9・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63），頁12。

² 初瀨龍平，《傳統的右翼：內田良平の研究》（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80），頁20-23。

³ 初瀨龍平，《傳統的右翼：內田良平の研究》，頁14。

研究的嚴謹與客觀的前提下，從中國的觀點對其加以批判。

其次，是對於大亞細亞主義思想基礎的分析，過去竹內好已從外在情勢的變遷，指出亞細亞主義產生於明治維新以降歐化派與國粹派、國權論與民權論之爭。⁴但形成亞細亞主義的內在思想因素為何？作者提出兩個思考方向，首先指出日本近代大亞細亞主義不能忽視的思想基礎是民族主義，一方面走向極端成為大和民族優越論，同時另一方面否定他國民族主義，成為對周邊諸國的輕蔑觀，兩者互相加成，決定了日本近代大亞細亞主義思潮的基本方向，自始即缺乏對於鄰國的平等連帶觀，過去韓相一也從韓國的角度對於亞細亞主義提出過類似批判。⁵其次，對於大亞細亞主義之所以變質為大陸政策的理論基礎，以往學者多半著重在日本自甲午、日俄戰爭勝利後，對於國力抱持自信的「大國意識」油然而生，使得做為亞細亞主義出發點的危機感減弱，原先強調與亞洲鄰國的連帶觀念亦變質為強調日本做為文明國家的使命感。⁶趙軍則從另一個角度加以觀察，也就是日本近代價值觀的改變。眾所周知，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推行歐化政策，採取協調外交，一方面屈從於歐美強國，另一方面則以弱小鄰國為其對外擴張目標。福澤諭吉鼓吹的「文明開化」、「脫亞論」就是日本價值觀變遷的例證。作者認為近代日本歐化政策強調西洋文明的優越性，使得日本社會既有的儒家、佛教思想等亞洲傳統價值觀隨之崩解，日本在精神層面上既已喪失了與亞洲鄰國共通的心理基礎，則連帶理念無疑於緣木求魚。因此在自由民權運動的後期，大亞細亞主義的主流由「興亞」轉向「脫亞」。在大亞細亞主義何以朝向國權主義、擴張主義的方向轉變這一議題上，過往的研究多著重於 1880 年代以後中日兩國圍繞著朝鮮半島的競爭，而趙軍則從日本價值觀的轉變加以觀察，提供

⁴ 初瀬龍平，《傳統的右翼：內田良平の研究》，頁12-13。

⁵ 韓相一著，李健、瀧澤誠譯，衛藤瀋吉、瀧澤誠解說，《明治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理念と現實—日韓近代史の空間》（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84），頁21。

⁶ 初瀬龍平，《傳統的右翼：內田良平の研究》，頁23。

了一個新的切入角度。

當然本書也有若干值得商榷之處。第一，由於本書為論文集的形式，固然分章探討能對於個別人物的思想做較詳盡的評析，但也可能造成在討論上陷於孤立，以本書列舉的人物而言，先就宮崎滔天的部分來說，其被視為中國革命最忠實的友人之一，作者卻只有詳細分析其「支那革命主義」的理念，對於他參與中國革命的行動卻絲毫未提及，相對照於作者強調大陸浪人的最重要特徵，是基於大亞細亞主義理念的實踐活動，則不免自相矛盾。再者，頭山滿、內田良平、川島浪速皆為國權派大亞細亞主義者的代表人物，但對三人的討論卻是各自為政，而欠缺橫向的比較分析。如內田良平與宮崎滔天，分別為國權派與民權派亞細亞主義的代表人物，但兩人在辛亥革命期間卻同樣參加了支援中國革命的「有鄰會」，是否表示雙方的中國觀（至少在辛亥革命時期）具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頭山滿、內田良平同樣是出身於玄洋社的國粹主義者，在諸多對外議題上也互通聲息，因此對於兩人的討論似可考慮合併於一章，將雙方觀點、手段的異同加以對照比較。而內田良平與川島浪速亦然，在辛亥革命期間，支持革命派的內田，與策劃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的川島之間看似毫無交集，然而內田雖然主張協助中國本土的革命運動使其成功，同時卻也要防止革命波及滿洲：

前年（1909）以來，黃興、宋教仁等領袖，屢次進入滿洲，透過與馬賊、革命黨員之聯絡，以一旦南方有事，正得以發難之準備，有欲召集滿洲之兵力牽制北京之議，小生斷然排除此議，因滿洲日俄之利害關係不少，若紊亂滿洲秩序之時，兩國至於不得已出兵，遂不保無招致列國干涉，以此懇切勸說於滿洲之舉兵計畫應以中止為上策，漸得令其阻止。⁷

⁷ 〈內田良平渡鮮の途中より益田孝に与へたる書翰控〉，明治44年10月26日，收入內田良平文書研究會編，《內田良平關係文書》，第1卷（東京：芙蓉書房，1994），頁334-335；〈益田孝宛內田良平〉，明治44年10月26日，收入小川平吉文書研究會編，《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書翰、電報、會談覺，頁398-399。

甚至欲使滿洲在日本的指導下獨立。⁸雙方在中國革命及滿蒙問題上的態度，實可謂平行、交錯兼而有之，若能針對內田與川島在觀點、行動策略的異同進行分析，就不難理解何以當川島利用洪憲帝制策動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時，內田即力圖將川島與日本在滿洲軍人這兩股滿蒙獨立勢力加以整合。

第二，則是關於討論對象的選擇問題，由於大亞細亞主義的多樣性、複雜性，因此想要從中挑選若干代表人物以求理解其全貌，自然不免有掛一漏萬之處。當然，不容否認作者所選擇的討論對象多具有一定的意義，然而還是可以舉出若干頗富代表性卻被遺漏的人物。首先是荒尾精，荒尾精雖然不是最早在中國從事活動的大陸浪人，然而無疑卻是最具影響力的一人，著名的右翼團體黑龍會盛讚其為「東方志士的泰山北斗」，⁹其支那改造論被視為大東亞共榮圈的淵源之一，日清貿易同盟論亦被認為是西原借款之類經濟自給圈理論的先驅。其影響力更及於身後，其對華活動的人脈關係發展而成的東亞同文會，以及由其在甲午戰爭後的中國觀所衍生出的「支那保全論」，在明治末期的日本對外態度及活動上都曾經一度引領風騷。從戊戌變法、庚子拳亂，乃至於辛亥革命期間，東亞同文會及相關大陸浪人的中國認識都深受支那保全論的影響。¹⁰而其同志根津一主持的東亞同文書院也被視為培養中國通的搖籃。然而全書僅在序論中對支那保全論略加描述，對於荒尾精從甲午戰爭前經營漢口樂善堂以及日清貿易研究所，乃至於甲午戰爭後的中國觀，箇中變遷的討論卻完全付之闕如，既然作者在書中多次批判「支那保全論」，則對於此一思想從荒尾精、根津一，到近衛篤磨，經歷何種變化，似乎應當更深入的加以分析。其次是石原莞爾，其主張以日本、美國為代表的東西文明最終決戰論不僅繼承了

⁸ 黑龍俱樂部編，《國士內田良平傳》（東京：原書房，1967），頁506。

⁹ 黑龍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東京：黑龍會出版社，1933），頁321。

¹⁰ 關於從荒尾精到東亞同文會在對外理念上的因襲，可參考翟新，《東亞同文會と中國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對外理念とその實踐》（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1）。

亞細亞主義一貫主張的黃白人種對立論，更成為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理論依據。而其東亞聯盟論亦與近衛文麿的東亞新秩序相呼應。作者在第九章論及東亞新秩序時，雖有提及尾崎秀實等人的「昭和研究會」所主張的「東亞協同體論」，卻忽視了石原及其東亞聯盟。¹¹再者是同被視為日本近代國家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北一輝與大川周明，北一輝主張日本應捨棄傳統英日同盟、日俄協商，以英俄兩國協調的外交路線，而以亞洲盟主的身份協助中國及印度的獨立，此一論述就亞細亞主義的角度看來言之成理，然而與他主張的美日合作又似乎有所矛盾，北一輝是如何設法自圓其說？而大川周明所主張的「大東亞秩序建設」和日後的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之間又有何異同？大川與北一輝亦曾於猶存社共事長達四年，其對外認識的異同為何？¹²作者既然認定大亞細亞主義在昭和時代淪為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依據，則對於石原、大川、北一輝等對於日本對外擴張的相關論述有所著墨的人物，似乎亦值得更加以深入探究。

最後，書中部分的論點似乎有待商榷，首先作者以日本近代價值觀的變化，解釋大亞細亞主義何以從「興亞」轉向「脫亞」，然而這固然可以解釋福澤諭吉何以在朝鮮甲申政變失敗後，揚棄原本的東洋盟主論轉向脫亞論；亦適用於自由民權運動出身的大井憲太郎以自由民權、亞洲連帶理念為號召，意圖在朝鮮策劃政變的「大阪事件」；以及同樣參與自由民權運動的樽井藤吉，其所著的《大東合邦論》中為何一方面期待朝鮮的獨立自主，思考日本與朝鮮對等形式的合邦，另一方面卻又肯定、讚美日本的大陸發展，對於日本的朝鮮侵略毫無批判。¹³但就本書中所提出的大陸浪人個案而

¹¹ 對於東亞聯盟、東亞協同體等諸多主張與東亞新秩序的關係，見李永熾，《日本近代史研究》（臺北：稻禾，1992），頁347-359。

¹² 關於北一輝對外理念的探討，見黃自進，《北一輝的革命情結：在中日兩國從事革命的歷程》（臺北：中央研究院，2001），頁46-48、76。而北一輝與大川周明的分合過程，見同書，頁218-232。

¹³ 關於大阪事件，見黑龍會，《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

言，宮崎滔天雖然受到西方價值觀的薰陶程度最深，但其做為民權派大亞細亞主義的代表人物，卻是以西方的自由民權觀念，批判歐美為「野蠻的文明」。相形之下，頭山滿、內田良平出身於玄洋社，是對於歐化政策抱持強烈批判態度的國粹主義者，卻也是對於亞洲抱持侵略態度的國權派大亞細亞主義的代表人物。因此趙軍以日本採取歐化政策所造成價值觀的變化，說明大亞細亞主義何以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衰退而轉向國權論路線，固然不無道理，但若考慮到亞細亞主義內容的多樣性，恐怕仍須更進一步的分析。

另外雖然本書是屬於中日關係史的範疇，但大亞細亞主義同時涉及到日本與中國、朝鮮的關係，日韓關係的變化，尤其是 1910 年日本合併韓國對於中國的日本觀無疑造成了相當大的衝擊，¹⁴本書對於這方面的著墨明顯不足，就以和內田良平合作，推動日韓合併的韓國一進會來說，作者認為李容九（一進會會長）及一進會一面倒向日本期待論，對內田良平背後的日本帝國主義野心毫無警覺，此說似有商榷餘地。過去韓國學界對一進會幾乎一面倒的持批判態度，¹⁵但如今學者已重新審視一進會在日韓合併期間的立場及角色，認為一進會所以響應黑龍會推動的日韓「合邦」運動，實為欲藉此對抗日本將韓國主權逐漸解體的反抗措施，李容九並為了因應日本逐步蠶食韓國主權而提出「政合邦」理論。¹⁶就現存的文獻

1933、1935、1936），頁92-117；大井與樽井兩人的生平則見於《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下卷，頁137-138、281-283。對於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的批判，見旗田巍，〈大東合邦論と樽井藤吉〉、〈樽井藤吉の朝鮮觀—朝鮮併合の前夜—〉，《日本人の朝鮮觀》（東京：勁草書房，1969），頁51-59、60-69。

¹⁴ 關於日本合併韓國後，中國輿論的反應及日本觀的變化，參見今村与志雄，〈日韓併合と中國の日本觀〉，《思想》，537（東京，1969.3），頁92-109，總頁380-397。

¹⁵ 姜在彦，〈朝鮮問題における内田良平の思想と行動—大陸浪人における「アジア主義」の一典型として—〉，《歴史学研究》，307（東京，1965.12），頁13-22；楠原利治、北村秀人、梶村秀樹、宮田節子、姜徳相，〈『アジア主義』と朝鮮—判沢弘「東亞共榮圈の思想」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289（東京，1964.6），頁23-28。

¹⁶ 關於李容九對於「政合邦」的解釋見其所著〈竹洞夜話記〉，收錄於黑龍會，《日韓合邦秘史》，下卷（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0），頁591。近年來對於一進會及其「政合

看來，李容九對於日本的併韓野心絕非如作者所說的毫無戒心，其在 1909 年底致函日本眾議院議員小川平吉時，即言明其推動日韓「合邦」的目標絕非使日本併吞韓國：「而至貴邦人在京城（今日首爾）新聞記者團決議絕對併吞矣。夫容九蓄志五年而首倡大事，將欲以致社稷人民于萬安之地，永賴一家翕樂之慶也，非將欲以率四千載古國，一千二百萬韓民族為貴邦奴隸也。容九為奴而生乎，不若與一百萬會員、七十三萬襍負商及儒生外教徒自經溝瀆而死矣！胡乎役役乎復論國利民福哉。」¹⁷將李容九及一進會視為親日固無不當，但能否單純以「賣國」視之，恐怕尚有爭議的餘地。雖然韓國問題並非本書的討論主軸，但關於此一議題的研究早已所在多有，作者若能參考相關研究成果，或許會有不同的論點。

在去年（2010 年）10 月於中央研究院所舉行的日本研究研討會上，曾有學者提出一個觀點：「亞洲主義」是以日本自我為主軸，一種自我想像的思維型態，是日本人以日本為中心的立場，其構想中並沒有「他者」，即亞洲的存在。¹⁸大亞細亞主義既然是日本近代面對西力東漸危機下的產物，則其理念的闡述與實踐行動不可否認的當然是以日本中心為出發點，然而亞洲鄰國尤其是中國、朝鮮，面對東亞國際局勢的變化，無可避免的也基於自身立場對大

邦」理論的相關研究頗多，茲舉數例，西尾陽太郎，《李容九小傳裏切られた日韓合邦運動》（福岡：葦書房，1978）；金東明，〈一進會と日本—「政合邦」と併合—〉，收入朝鮮史研究會編，《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31（東京：龍溪書舍，1993），頁97-126；小川原宏幸，〈一進會の日韓合邦請願運動と韓國併合—「政合邦」構想と天皇制國家原理との相克—〉，收入朝鮮史研究會編，《朝鮮史研究會論文集》，43，《特集朝鮮における宗教と國家》（東京：龍溪書舍，2005），頁183-210。

¹⁷ 《韓國一進會日誌》，收於《朝鮮統治史料》，卷4，韓日合邦（II）（東京：韓國史料研究所，1970），頁821-822；李容九發小川平吉宛，明治42年12月28日，小川平吉文書研究會編，《小川平及關係文書》，卷2，書翰、電報、會談覺，頁386。小川平吉為政友會出身的眾議員，亦為東亞同文會的核心成員，為著名的對外強硬論者，和內田良平在日韓合併、中國問題上過從甚密。

¹⁸ 姜克實，〈「アジア主義思想の解析」〉，發表於「東亞中的日本與臺灣：日本研究新視野的探討國際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10年10月17日。

亞細亞主義做出了各種回應。韓國方面早已針對近代日韓關係史上與亞細亞主義相關的諸多議題，基於自身的立場做出解釋與評價。反觀中日關係史的領域中，日本學者的積極自不待言，而臺灣學術界由於長期漠視日本研究，以至於在諸多議題上的解釋權多半掌握於中國學界。希望本書可以提供臺灣學術界一個刺激，吸引更多學者對於中日關係史以及日本研究的關注。